

前沿论说丛书

朱熹新探

九六史披雲



林振礼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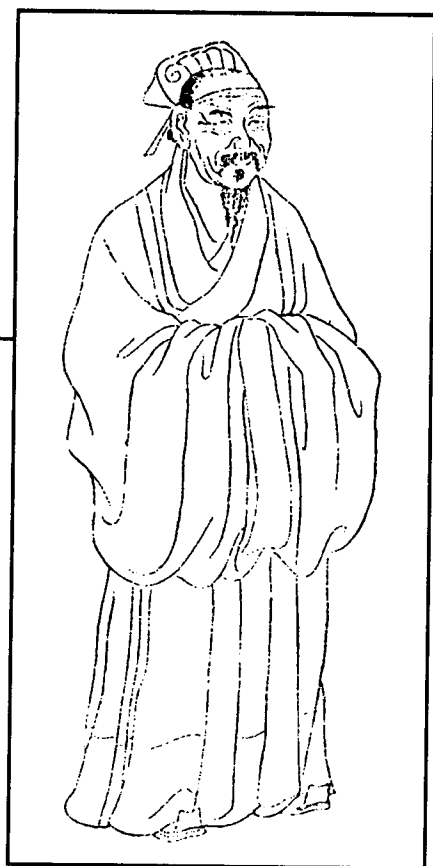
朱熹新探

朱熹研究



朱熹研究





林振礼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

朱熹新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熹新探 / 林振礼 著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3

(前沿论说丛书)

ISBN 7-5043-4145-2

I. 朱… II. 林… III. 理学—研究—中国

IV. G229.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86049号

朱熹新探

作 者:	林振礼
责任编辑:	刘耀钊
特约编辑:	陈程生
装帧设计:	高 峰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复外大街2号 (邮政编码 100866)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图文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308千
印 张:	13.75印张
印 数:	2000册
版 次:	200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43-4145-2/G · 1636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林振礼，1951年生于福建泉州。现任泉州师范学院学报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泉州学研究所副所长；兼任福建省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闽学研究丛书》编委。曾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哲学史》、《中国出版》、《编辑学报》、《瞭望》、《孔子研究》、《江西社会科学》、《福建论坛》、《集美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论著50余篇；出版专著《朱熹与泉州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参编《朱熹与闽学渊源》与《泉州学研究》等著作。

孔朱道脉
炎黄传统
剔除糟粕
发扬精华

书振礼墨朱君
新探公版法贺

乃川



厦门大学哲学研究所闽学研究室主任何乃川教授题辞

本书承蒙振兴中华教育科学
基金会、泉州师范学院著作
专项资助出版，谨此致谢！

蒙培元先生序

林振礼同志积 20 年之功,完成了这部《朱熹新探》的厚重之作,要我写一篇小序,我不能推辞。

作者在研究、写作此书的过程中,经常以通信或电话的方式与我讨论一些问题。对于研究范围之内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他都是那样认真,决不轻易放过,总要追究到底。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和严谨的作风使我深受感动。我除了从他那里知道很多有关朱子生活实践方面的知识之外,最大的感受是,在当今急于成名的时代,还有像他这样孜孜不倦、埋头耕耘、披荆斩棘、持之以恒地研究学问的学者,真是感到莫大的欣慰。

这本书并不是纯理论的学术著作,但是却洋溢着理论探索的精神和理论分析的气息。这本书也不是编年式的传记著作,但是却对朱子的人生经历有真实的描述,对朱子的心路历程有深刻的体会。这本书是深入到朱子的生活世界与心灵世界,对其人生和思想进行微观研究的独特之作,也是作者实地考察、亲身感受之作。其中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遗闻遗事,有迄今未曾涉猎或“语焉而不详”的学术问题。

这是一部史实考证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学术著作。他将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将哲学理念与时代背景相结合,将理论学说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将经典文化与民俗文化相结合,在互相补充,互相印证和比较的过程中,开拓出一个新的领域,呈现出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朱熹,并与之展开对话。这种研究方法,拉近了今人与朱子的距离,能够身临其境、“感

同身受”地理解朱子其人其学,同时又有很强的历史感。

要从事这样的研究,当然不能只在书斋中去完成,而要进行大量的野外作业。为了考证朱子的有关经历和事迹,作者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到各地去考察,收集各种资料。他曾亲赴朱子当年从政与讲学的湖湘地区,两次到朱子祖籍江西婺源,三次登临朱子办学的赣南、庐山,八次踏访朱子最喜爱且居住最久的武夷山。每到一地,他都要仔细寻访朱子的遗迹、遗物和遗墨,收集各种民间传说和地方志,甚至向当地老人询问各种习俗,从而为此书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精神,是他能够完成这部著作的重要保证。

他所收集到的各种宝贵资料,构成了这部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比如他新发现了朱子庆元年间的手迹,再与文献、方志互证,对于搞清朱子在“庆元党禁”中的实际处境及其思想活动,提供了过硬的第一手资料作依据,对朱子的研究就深入多了。

但是,实际考察和文物收集,虽然是他独有的优势,却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用力最勤而为之不懈追求的,还是一些理论和学术问题。在这方面他广泛地吸收了今人的研究成果,但又不是轻易作判断、下结论,而是在涵泳朱子著作的基础上,从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境出发,从每一次历史事件入手,透过朱子的实践活动,剖析其思想形成的条件和历程,在相互比较中提出自己的见解。正因为如此,此书不是对朱子生活经历的一般叙述或遗闻遗事的描写,而是通过朱子的实践活动展示其内心世界及其理论学说。“情境意识”和“实践意识”是此书的最大特点。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都是在具体情境与实践活动中阐明他们的学说的,每一个概念、范畴,都不是在纯粹的“理论沉思”中形成的,因而不是形式的、

抽象的,而是有实际内容的。朱子也不例外。此书就是在这一思路之下写成的。

比如,朱熹的“中和”新旧说,是学者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它标志着朱子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变。但是,朱子为什么从“中和旧说”转变为“中和新说”?这种转变是如何可能的?其意义何在?学者们通常都是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和解释(包括笔者)。作者则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同时展开研究。在比较各种观点的同时,更重视朱子所处的历史时代及其实践活动。具体地说,他是通过朱子38岁的湖湘之行,第三代主战派的学术集会,苦参“中和”的经历,说明其由“旧说”向“新说”升华的内在联系。他既不取牟宗三先生的“别子为宗说”,亦不取金景芳先生的“程朱悖谬说”,而是吸收任继愈先生的“文化嫁接说”,使其更能接近朱子诠释《中庸》的历史实际。同时又参照某些学者(蒙培元)关于情感哲学的观点,阐明朱子“心统性情说”的理论内涵,使朱子“中和新说”的意义得以彰显。这是从具体情境和实践出发,从方法上解读朱子的一个突出的例证,也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这部著作开辟了许多新领域,提供了理解朱子的许多新空间,体现了作者敢于言人之所未言的探索精神。“朱子的风水观”、“朱子与摩尼教”、“朱子在民间的多重形象”等重要章节,就是其中最特色、最有突破的成果。作者从佚文考辨和野外调查开始,进到生态、宗教和美学等诸多领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填补了朱子研究的许多空白。

“风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与人民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也为一些思想家所重视。但是,过去一律被斥之为“封建迷信”,因而很少有人研究。其实,“风水”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而人与自然的生态问题,就是其中很重

要的内容。作者根据朱熹的有关资料,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考证和理论分析,提出了新的见解,使他成为我国研究朱熹风水观的最早、最重要的学者。

朱熹与摩尼教的关系,是涉及中外文化关系的一个极有意义、极有趣味的问题,但是,由于资料的缺乏,长期以来无人进行研究。今天,摩尼教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泉州,至今却保存着摩尼教的一座寺庵。这为研究朱熹与摩尼教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20世纪80年代,美籍华人陈荣捷教授来大陆,走访并收集过有关朱子的遗迹和资料,写成《朱子新探索》,其中也有“魔”之讨论,但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未能继续研究,故只讨论朱子知漳州时“禁魔”之一事,并且认为,朱子所禁者,为佛教而非摩尼教。作者根据相关资料,重新考证了摩尼教在泉、漳一带的传播情况以及朱子与之有关的行踪与言行,认为朱子所禁之“魔”正是摩尼教而非佛教,并进而提出“仕泉偶涉,知漳则禁”的结论,真可谓“石破天惊”。他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要推翻这一结论,则需要花更大气力,提出更有力的证据。

历史上的朱子与民间传说中的朱子是不同的,“道学化”的朱子和人性化的朱子也是不同的。但是,这二者同时存在于福建一带。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文化现象。后者虽不是“历史的真实”,却活在人民的心中。作者对于大量的见诸笔记小说与口头传说中的轶闻轶事,给予了高度重视,作为俗文化的重要资料,与正史记载互相参照,互相比较,从不同层面说明朱子人格形象的多重性,赋予其新的文化义涵,为重新解读朱子提供了新的视角。

实际上,书中的每一章都有新材料,新见解。诸如“考评”、“杂识”、“出版”、“教育”以及佚文辑录等等,都是作者辛

勤耕作、呕心沥血之所得，具有重要的文化史的价值。这些价值将随着朱子研究的不断深入而逐渐呈现。当然，其中的某些见解，不无可商榷、可讨论之处。但这都是作者独立体会出来的，不是轻易得出的，更不是简单的概念推演所能作到的。

作为一部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著作，此书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的特征，但是，其中包涵着普遍的文化价值。正如朱子学被称为“闽学”，其影响则不止于中国，而且及于东亚地区一样。全书并没有什么“宏大叙事”，但是，能从细微之处见其全豹。这正是此书的一大优点。

读此书者，必将得到享受。

2004年7月25日序于北京

引言

朱熹是我国封建时代影响极为深远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儒学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1988年“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成立时，蔡尚思先生题诗道：“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和武夷。”然而，朱熹又是一位聚讼纷纭的历史人物。他在极其复杂的人生历程中饱受忧患，遭谗受贬，晚年在“庆元党禁”中被打成“伪学魁首”，饮恨终天。死后其著作与学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操纵我国哲学、教育、礼制凡700年。支配日本、朝鲜之文化，亦数百载。

“五四”以来，朱子学说失去了往昔的独尊地位，“打倒孔家店”，批判“以理杀人”，朱熹首当其冲。“文革”中批林批孔批朱熹，人们记忆犹新。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兴起儒学和朱子学研究热，举行了多次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学术界拨乱反正，摆脱了以西律中的固有模式，提倡注重历史演变与层次角度，强调历史还原与科学再现朱子，使学术研究绕过了历史的弯道而步入坦途。

余读张立文先生《朱熹思想研究》，始窥朱子之宏博；读蒙培元先生《理学范畴系统》，粗知理学之门径；读陈来先生《朱子哲学研究》，略悟创新之方法。其后，新成果不断涌现，束景南先生《朱子大传》、《佚文辑考》、《年谱长编》，郭齐先生点校

《文集》，笺注诗词，《新考》并《传》，其个人耗费了巨大精力，却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之便。而经学、文学、美学、史学、自然哲学、书院教育、生平传记、事迹考论、思维世界等专著，亦不胜枚举。世纪交替之际，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诸先生集群体力量，历时 10 年编纂而成的《朱子全书》出版，又将使朱子学研究出现新的高潮。

回顾 1990 年秋福州—武夷山纪念朱熹诞辰 86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学者云集，期间往建阳谒朱子墓，是日雨天路滑，当地村民用轿子把著名哲学史家、年届 90 高龄的陈荣捷先生抬上山，陈先生在墓前毅然下跪，其庄严虔诚之状，余深深为之感动。归后读陈先生《朱子新探索》，获益良多。遥想前贤筚路之功，后学尤当勤勉不怠。是故长期以来，在汲取诸多学者研究成果的同时，刻意寻觅朱子研究之薄弱点，涵泳其间，以成文字。

“濒海通商，民物繁夥，风俗错杂”^①的泉州，既是朱熹初仕，又是其一生中任地方官时间最长的地方。泉州又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在海外交通鼎盛的宋元时期，就有多种外来宗教聚集在这里，但儒家文化仍然处于主干地位。然而，本土文化与多种外来文化是怎样碰撞交融互为渗透的，必须加以重视和认真探讨。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考察泉州时曾指出，泉州历史上有有个中外“文化接触”的问题。^②朱熹是经历这种多元“文化接触”的最重要的思想家。本书第一章通过阐述南宋泉州社会对朱熹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朱子理

① 《朱熹集》卷八十九《范公神道碑》，第 4560 页。

②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馆长王连茂先生曾多次谈到费老所说的“文化接触”问题。

学文化发生的社会原因。其中的“文庙府学风水之争”亦即中外“文化接触”问题。事情发生于绍兴间赵令衿知泉之际，外国商贾建层楼（清净寺）于文庙府学之前，地方上的士大夫、读书人认为清净寺建于府学之前破坏了“巽水汇洙泗”的好风水，于是群起而告官。地方官（通判）傅自得判决“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立戎兵官，即日撤去，清净寺由罗城内迁建于城外濠。这样，既不破坏泉州受盛于山川的“科第人文”，又使清净寺作为点缀品，为文庙增胜。这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由冲突到和合的例证。朱熹于 1183 年为傅自得所撰的《行状》中详细记载这一事件，我们认为，它的重要意义之一，即为朱熹后来成功地应对禅佛教、摩尼教的挑战提供了借鉴。

朱子学既涵有超越具体时代的智慧，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种种误区。有如本书第一章通过对朱熹“理欲初辨”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朱熹理欲之辨的原始意蕴，有助于认识朱熹这一伦理命题的合理内核。随着历史的发展，朱熹政治伦理哲学赖以产生的时代背景早已消失，其具体的政治主张和伦理观点也多失去原有的意义。但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文化的道德精神仍然积淀于我们民族的传统中，生长于我们民族的心理结构之上。然而，我们过去由于缺乏“理性自觉”能力，造成了一些认识上的模糊和混乱。回顾 20 世纪 70 年代，报刊杂志对于孔子“克己复礼”和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批判，大多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事实上，朱熹的理欲之辨并非禁欲主义，他曾以饮食为例，说明理欲分际：“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¹² 12 世纪的南宋国运日衰，灾害频仍，劳动人民谈何美味，存理灭欲实际所指是奢侈无度的皇室贵族和少数官吏。朱熹理欲之辨实质是综罗了先儒的义利、公私之辨提出的修养准则，其初衷在于规谏统治者不能竭泽

而渔,应省赋恤民,以利社会和谐。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出现事与愿违的背反,即统治者顺手接来,使理欲之辨由道德修养的向内工夫转化为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值得反思的是,当年批孔批朱的同时,我们的政治经济生活中也在提倡“狠斗私心一闪念”、“舍小家为大家”、“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等一系列克己奉公、舍己为人的口号。试想,“斗私”不正是“克己”的转生吗?“集体个人之辨”亦即公私之辨,不也正是理欲之辨在当代社会的转生吗?再如理学家的堪舆思想对民间葬俗的影响,本书第四、五章通过对朱熹风水观的文化解读,既揭示了朱熹风水理论中蕴含的合理因素,又指出其“葬先荫后论”至今存在着消极影响。承认理学文化及其学术精神至今积淀于现代社会的文化土壤之中,以多元、开放、理性的心态和方法,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作深入反省,在与世界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作出选择,使其以新的活力面对新世纪的各种挑战。

朱熹一生不惟读书,又因“格物”而博学,成就其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而余所作的挖掘与诠释,仅冰山之一角。因此,拙著以“新”命名,非敢自诩,当自励也。本书撰写过程中,从诸多时贤的学术成果中吸取了不少营养。书中同某些专家学者的不同看法,也是在他们的启发下提出的,首先应该向他们表示感谢。

目 录

蒙培元先生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从初仕泉州看朱熹理学产生的社会原因	
一、二十四岁前的游学、科考与婚姻生活	(1)
二、殷忧启圣：南宋泉州社会对朱熹的影响	(14)
三、逃禅归儒：格物、分殊滥觞，理欲、忠恕初辨	(29)
第二章 从“湖湘之行”看朱熹哲学升华的政治原因与历史意义	
一、第三代主战派风云人物学术集会的政治原因	(39)
二、“明此学”的目的：于政治圈外建立理论权威	(48)
三、中和新说：藉“文化嫁接”重铸新儒学	(58)
第三章 朱熹与庆元党禁的考察与反思	
一、劾唐仲友，朱熹卷入政治风潮	(75)
二、台谏交奏，赵韩力量消长透视	(82)
三、避地入山，“此身未有栖留处”	(90)
四、以身殉道，世间真伪有谁知	(99)